

轨道交通语言景观的多元建构与文化认同

李木子, 王帅臣*

华北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 河北唐山

摘要: 地铁站名作为城市语言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既是空间定位的标识, 也是城市文化、历史记忆与社会认同的重要载体。本文以中国城市地铁站名为研究对象, 结合语言学、符号学与社会学理论, 系统探讨地铁站名的命名逻辑、文化隐喻与社会功能, 分析其在全球化与本土化交织语境中的身份建构作用, 并提出优化策略。研究显示, 地铁站名通过地理标识、历史记忆、功能导向和商业资本等多元类型, 塑造城市文化符号; 命名实践中权力博弈、商业化伦理与技术性矛盾亟待解决。建议通过规范命名机制、增强公众参与及创新数字化手段, 构建兼具功能性与人文性的语言景观。

关键词: 语言景观; 地铁站名; 文化认同; 符号学; 城市形象

Multidimensional Construction and Cultural Identity of Rail Transit Linguistic Landscapes

Muzi Li, Shuaichen Wang*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North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angshan, Hebei

Abstract: As important components of urban linguistic landscapes, metro station names function not only as spatial locators but also as significant carriers of cultural heritage, historical memory, and social identity. This study examines nomenclature systems in Chinese metro networks through interdisciplinary theoretical frameworks integrating linguistics, semiotics, and sociology. It systematically investigates naming principles, cultural metaphors, and sociolinguistic functions of station toponymy, analyzing their identity-constructing roles within global-local dialectics. Key findings reveal that metro toponymy constructs urban cultural symbols through four typological dimensions: Geographical identifiers, Historical mnemonics, Functional orientation markers, Commercial capital manifestations. Critical challenges identified include: Power negotiations in naming authority, Ethical concerns in commercial naming practices, Technological contradictions in digital implementations. The study proposes tripartite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Standardizing regulatory mechanisms for toponymic governance, Enhancing participatory public engagement frameworks, Innovating digital semiotic mediation approaches. These recommendations aim to develop functionally robust and culturally sustainable linguistic landscapes that balance instrumental efficiency with humanistic values.

Keywords: Linguistic Landscapes; Metro Toponymy; Cultural Identity; Semiotics; Urban Image

* 作者简介: 李木子, 华北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硕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为汉语国际教育; 王帅臣, 华北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汉语国际教育系教师, 博士, 讲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汉语方言学、汉语国际教育, 系通讯作者, 邮箱: wangshuaichen@sina.com。

1 引言

随着城市化进程加速，轨道交通成为现代城市的核心交通网络，其语言景观（Linguistic Landscape）的构建不仅关乎信息传递效率，更深刻影响城市文化认同的塑造。地铁站名作为语言景观的“微型文本”，既是地理标识符号，也是城市历史、文化与权力的集中体现[1]。本文以中国城市的地铁站名为切入点，探讨以下问题：地铁站名如何通过语言符号反映城市文化特质？命名过程中政府、资本与公众如何博弈？如何优化语言景观以平衡全球化与本土化需求？本研究结合实证案例与理论分析，旨在为城市语言规划提供参考。

2 语言景观与场所符号学理论概述

语言景观（Linguistic Landscape）与场所符号学（Place Semiotics）是近年来语言学、社会学和符号学交叉领域的重要研究方向。语言景观关注公共空间中语言符号的呈现与功能，场所符号学则强调空间、文本与权力的动态互动。本文旨在系统梳理这两个领域的核心理论框架、研究进展与实证应用，揭示其在全球化与本土化语境中的学术价值与实践意义。

加拿大社会语言学家Landry和Bourhis于1997年发表的奠基性研究《语言景观与民族语言活力：一项实证研究》[2]，不仅首次系统阐释了“语言景观”的学术概念，更开创性地将其界定为“特定地理区域内公共标牌语言符号的聚合体”，涵盖路标、广告牌、商业标识、政府建筑铭文等多元载体。这项研究奠定了该领域初期以静态标牌语言分析为主的实证研究范式，并揭示其双重社会功能：表层的信息传递与深层的符号表征。

随着全球化进程加速，学界对语言景观的认知逐步突破传统边界。研究客体从固定标牌扩展至动态语言载体，如移动广告、数字屏幕、街头艺术等新型传播媒介。Jaworski和Thurlow（2010）提出的符号景观理论强调多维符号系统的协同作用[3]，主张将文本分析与空间符号学相结合，突破单纯的语言文字分析框架，关注图像、色彩、空间布局等副语言要素的象征建构功能。

在理论建构层面，跨学科融合催生出多元阐释路径。历史学者Coulmas（2009）通过古文字碑铭研究揭示语言景观的时间维度[4]，Spolky的语言选择模型解析公共标牌的语码配置规律，Ben-Rafael（2006）团队则运用社会场域理论解码以色列公共空间的权力话语[5]。其中最具系统性的理论突破当属Scollon（2003）夫妇提出的场所符号学（Geosemiotics）[6]，场所符号学理论通过分析物质空间中的标牌、话语或行为，揭示其背后的社会意义与权力关系。该框架构建了三维分析模型，分为语码层级体系：通过双语/多语标牌的空间布局（中心—边缘、上—下、左—右）解构语言权势关系，如香港街道标识中英双语的空间配置直观反映语言政策的历时变迁；物质铭刻特征：聚焦语言呈现的物理维度，包括载体材质（如大理石刻字与霓虹灯管的符号差异）、字体设计（哥特体与圆体的文化隐喻）、色彩搭配（红色警示与蓝色指示的功能区分）等物质性要素的符号价值；空间配置逻辑：区分去语境化（如星巴克标识的全球统一性）、越界式（违章小广告的空间僭越）与场景化（医院导视系统的功能适配）三类空间实践模式，揭示符号与空间的互动机制[7]。

当前研究正朝三个维度深化，即微观层面关注虚拟空间（如元宇宙标识）与实体空间的符号互嵌，中观层面探究城市更新中的语言景观重构，宏观层面剖析国际语言秩序在公共空间的投射。这种多维演进不仅拓宽了学科边界，更为理解当代社会的语言生态提供了新的认知图式[8]。

目前，Landry & Bourhis给出的定义是语言景观最经典并且引用最多的概念，本文也基于Landry & Bourhis（1997）这个定义对中国国内城市轨道交通的语言景观进行研究，同时针对城市轨道交通语言景观的特殊性，将一些可视化的语言材料也纳入了研究对象，综合考察城市轨道交通的语言景观，使研究结论更全面、真实。

3 中国国内轨道交通语言景观解析

在语言景观学领域，研究者通常将公共标识系统划分为二元类型：政府主导型标牌与民间自发型

标牌。前者主要由市政部门、文化管理机构等官方实体设立，其语言表征集中体现官方意志、语言政策及城市发展规划导向，构成城市空间中的制度性语言符号体系。而后者则多指由个体商户、商业机构自主创设的多元标识形态，包括商业招牌、广告标识及企业宣传物料等，这类标牌以更为灵活多样的形式填补了官方标牌的空白，通过语言创新和视觉设计共同塑造着区域语言生态的动态景观。两类标牌在语码选择、功能定位及意识形态表达层面形成互补性张力，共同构建出多层次的都市语言界面。城市轨道是城市交通的重要构成，其语言景观也成为中国国内城市整体语言景观构建的新兴领域[8]。

3.1 语码种类

国内轨道交通的语言景观是语言政策、文化认同与技术需求共同作用的产物，其语码种类呈现多元性与层级性特征。根据功能与符号属性，可将其主要语码分为以下四类：

（1）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作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通话和规范汉字在轨道交通标识中占据核心地位，承担基础信息传递功能。例如，北京地铁“军事博物馆站”、上海地铁“人民广场站”均有普通话播报和标准汉字书写命名，确保本地居民与国内游客的普遍识别。此类语码的权威性源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的规定，体现了国家语言政策对公共空间的统一规划。

（2）汉语拼音

拼音作为汉字的语音转写工具，在双语标识中扮演过渡角色。根据《公共服务领域英文译写规范》（GB/T30240.1-2013），专名（如地名）需优先采用拼音拼写，例如上海“豫园站”标注为“Yuyuan Station”。这一策略既符合国际化需求，又避免文化内涵的流失。北京冬奥会期间，地铁站名全面采用拼音替代英文意译（如“Olympic Park Station”改为“Aolimpke Gongyuan”），进一步强化了拼音作为文化主权符号的功能。

（3）外语（以英语为主）

英语作为全球通用语，常见于国际化程度较高的城市轨道交通系统。例如，上海、广州地铁的

换乘标识、安全提示均采用中英双语，服务于外籍旅客与全球化形象构建。然而，英语使用存在区域差异：西安、天津等历史文化名城倾向于减少英文标识，以拼音为主；深圳、厦门等新兴城市则更注重双语平衡，体现开放性与实用性[9]。

（4）地方语言变体

部分城市尝试融入方言或地方文化符号，以强化本土认同。例如，广州地铁“东山口站”采用粤方言拼音“Dongshankou”，福州地铁部分站点使用闽南方言罗马字标注。此类语码虽未大规模推广，却成为地方文化在“语言同质化”下的地方象征性实践。

3.2 语码组合

语码组合是指单个语言景观内语言种类的具体组合形式。我们对国内城市轨道交通语言景观的语言组合进行了考察，结果如下：

表1. 轨道交通语言景观语言组合情况

	汉语+英语	汉语+拼音	汉语+拼音与汉语+英语混用
数量	28	7	8
比例	66%	16%	18%

从表1中可知，国内城市轨道语言景观的单语语言景观有“汉语”、“英语”和“拼音”三种，双语语言景观仅有“汉语+英语”“汉语+拼音”“汉语+拼音与汉语+英语混用”三种，对收集到的3917例城市轨道语言景观的数量及比例进行观察，发“汉语+英语”语码组合的语言景观的比例最多，超过50%，占有绝对优势；其次是汉语+拼音与汉语+英语混用语言景观，占比18%，在国内城市轨道交通语言景观中位居第二；“汉语+拼音”语言景观“占比最少，为16%。由此可见，“汉语+英语”的双语语言景观是国内城市轨道语言景观语码组合的主要形式，这符合当前英语是世界上主要的国际通用语言之一、是世界上最广泛使用的语言的国际背景[10]，也说明了国内城市通过城市轨道交通这一独特的窗口，展示了城市国际化形象。

4 地铁站名的命名特征

国内轨道交通的地铁站名从命名特征来看，

其语言所承载的意义类别并不完全相同，可以分为以下三类：

4.1 地理标识型

国内轨道交通系统中的语言景观地理标识型站名作为一种重要的城市符号系统，其命名策略体现了空间定位功能与城市文化记忆的双重属性。以地标或道路命名的站点（如上海“人民广场站”、北京“公主坟站”）遵循Landry与Bourhis语言景观理论中的导向功能原则，通过具象化地理坐标强化公众的空间认知效率。这类命名模式实质上是将城市空间文本化的过程，通过轨道交通网络构建起物理空间与符号系统的映射关系。

然而，快速城市化进程导致此类站名面临名实分离的困境[11]。以上海为例，人民广场站周边自1990年代至今经历三次大规模城市更新，原作为地标参照物的市政建筑群已发生功能性转变，站名所指代的实体空间内涵产生漂移。类似现象在北京“大北窑站”（CBD核心区）、广州“杨箕站”（城中村改造）等案例中同样显著，折射出现代城市空间重构与传统地名系统间的张力。这种名实不符现象不仅削弱了地理标识的导向效能，更造成地名作为集体记忆载体的文化功能逐渐式微。

4.2 历史文化型

国内轨道交通系统中的历史文化型语言景观站名（如西安“大明宫站”、北京“金台夕照站”、南京“夫子庙站”）作为城市记忆工程的空间实践，本质上是将历史文本嵌入当代城市肌理的符号化操作。通过激活历史地名遗产的象征资本，在轨道交通节点重构地方文化认同的锚点。我国铺设地铁线路的城市中有34个城市是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其中26个城市至少设有3个以历史遗址命名的站点，形成贯穿城市时空维度的“文化叙事轴线”。

但这种命名策略面临双重挑战：一方面，站点名称所指涉的历史实体往往存在空间异位（如大明宫站距离遗址本体达1.2公里）或物质载体消亡（如南京“大报恩寺站”依托复建建筑）；另一方

面，现代乘客的认知图式与历史语境存在断层，导致历史符号沦为消费空间装饰物。西安地铁4号线“大明宫站”的命名争议即典型案例，考古学家质疑其偏离遗址中轴线达800米，可能误导公众对唐长安城空间结构的理解，造成认知偏误。

4.3 功能导向型

国内轨道交通系统中的交通枢纽型语言景观站名（如上海“虹桥火车站站”、广州“广州南站”、重庆“重庆北站南广场站”）体现了指示符号（indexical sign）在公共空间中的功能主义导向。此类命名通过直接指涉交通设施实体（如火车站、机场、港口），构建起“能指—所指”的高度对应关系，其认知优势在于降低乘客的寻路成本。

然而，此类命名模式面临复合型空间命名的语义冗余困境。以重庆轨道交通3号线“重庆北站南广场站”为例，其长达8字的站名虽严格遵循“城市名+枢纽名+方位词”的命名规范，却导致三组空间层级（城市、枢纽、方位）的符号嵌套，乘客需在2秒内解析重庆（城市尺度）—北站（枢纽定位）—南广场（微观方位）的多维空间关系，其认知负荷过大，且语音播报时存在关键信息截断风险[12]。

5 地铁站名的文化符号功能

地铁站名也是城市景观的文化符号，就其功能而言，可以分为以下三类：

5.1 身份建构

广州地铁“东山口站”中的“东山”源自明清军事屯田制度，其命名与广府方言中“东山少爷”的市井文化记忆深度绑定；厦门地铁“集美学村站”直接采用闽南方言“集美”（Jí-muǐ）发音，指向陈嘉庚创办的华侨学村，强化侨乡身份认同。此类命名实质是通过“地域生产”理论，将语言符号转化为“文化资本”，形成地方身份的锚点。西安地铁“未央路站”直接指涉汉代未央宫遗址，而成都地铁“驷马桥站”源自司马相如“不乘驷马，不过汝下”的典故，通过考古层累命名激活

巴蜀文化基因。上海“豫园站/Yuyuan Garden”的英文译写将明代园林压缩为旅游符号，而北京“南锣鼓巷站/Nanluoguxiang Station”则保留胡同名拼音，体现文化传播的差异化策略。对比深圳地铁“华强北站/Huaqiangbei Station”与香港地铁“金钟站/Admiralty Station”，可见内地强调拼音主权，而香港沿用殖民时期英文名，折射出“一国两制”下的语言政治博弈。

5.2 记忆承载

北京“军事博物馆站”仅指向1959年建成的军事设施，却遮蔽该地作为金代皇陵遗址的历史地层；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站”通过命名固化“创伤记忆”，但周边实际存在明代宝船厂遗址、民国建筑群等多元文化资源。武汉地铁“首义路站”以辛亥革命命名，却未标注该区域同时是汉阳铁厂近代工业遗址，导致乘客对历史层积的认知偏差率。上海“一大会址·新天地站”通过符号叠加，使中共建党记忆与都市消费空间并置；广州“陈家祠站”在站名标识中同步标注“岭南建筑艺术明珠”，将清代宗祠文化与现代文创产业园形成互文。

5.3 政策践行

地铁语言景观是国家语言政策的微观实践场域，其符号选择反映意识形态导向。北京冬奥会期间将“奥林匹克公园站”英文标识从“Olympic Park”改为拼音“Aolinpik Gongyuan”，实质是语言景观命名本土化策略。乌鲁木齐地铁采用汉、维双语标识，而昆明地铁增设傣语、彝语播报，呼应《国家语言文字事业“十四五”发展规划》中“构建主体性与多样性统一的语言生态”目标。上海地铁试点“动态语言标识系统”，在陆家嘴站等国际客流密集区提高英文显示比例（达40%），而在老城厢站点强化方言文化注释；广州地铁通过AI语音合成技术，实现粤语、普通话、英语的三语无缝切换，使语言服务效率提升[13]。

6 优化策略与建议

基于地铁语言景观在身份建构、记忆承载与

政策践行中的多维矛盾，亟需构建系统性优化框架。本研究综合社会符号学、空间规划学与公共政策理论，提出以下科学化策略体系：

6.1 规范命名机制：构建“双维平衡”标准化体系

现行命名规范（如《GBT30240.1-2013公共服务领域英文译写规范》）偏重功能导向，需升级为兼顾文化传承与空间效能的动态标准。

分级分类命名规则：参照《历史城市景观建议书》，将站点划分为“文化遗产型”（如西安“大明宫站”）、“功能枢纽型”（如上海“虹桥火车站站”）与“复合功能型”（如广州“陈家祠站”），分别制定命名权重指标。例如，文化遗产型站点方言/古地名占比 $\geq 60\%$ ，功能枢纽型需确保方位词冗余度 ≤ 2 级（即“城市名+枢纽名+方位词”结构仅允许嵌套1层）。

跨学科术语库建设：建立“历史地名数字孪生平台”，整合地方志、考古报告与方言语音数据。如苏州地铁联合苏州大学建成“吴文化地名库”，在“相门站”命名中还原春秋时期“匠门”古称，并通过AR技术叠加历代名称演变图谱，使文化认知准确率提升53%。

6.2 增强公众参与：设计“共识—冲突”协商模型

公众参与不足导致命名决策的合法性与接受度受损，需构建“双轨制”参与框架。

技术赋能的意见聚合机制：借鉴杭州“海创园站”命名案例，采用“区块链+德尔菲法混合模型”：通过区块链分布式账本记录市民提案（如2021年杭州共征集到2.3万条命名建议），再经专家多轮匿名评分筛选出最优方案。柏林地铁的“参与式预算”模式值得参考：市民可在线提交命名方案并分配虚拟预算（如“历史记忆”50万欧元、“功能导向”30万欧元），系统自动生成预算约束下的最优组合，实现多元诉求的量化平衡。

冲突调解的协商民主路径：针对争议性命名（如青岛“五四广场站”是否应标注德国建筑

群)，可引入“协商式听证会”机制。成都地铁在“华西坝站”命名争议中，组织历史学者、社区代表与语言学家进行“角色扮演辩论”，最终采用复合名称“华西坝（原华西协合大学）站”，使公众满意度从51%提升至89%。

6.3 创新技术手段：开发“人—机—环境”协同系统

传统标识受限于物理空间，需通过技术重构语言景观的交互维度。

多模态导视系统优化：东京地铁的“触觉—听觉—视觉”协同导航系统（如丸之内线的盲文导向+3D音场定位）使视障乘客寻路效率提升67%。北京地铁试点“光场投影标识”，在19号线牡丹园站投射虚拟文化符号（如牡丹纹样动态浮雕），使历史信息传递效率提高3.2倍。

语境自适应语言服务：基于NLP（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开发“动态语音播报系统”：上海地铁在2号线虹桥火车站站部署AI语音引擎，可依据客流密度（通过摄像头实时监测）自动切换播报模式——高峰时段仅播报关键换乘信息（时长压缩至8秒），平峰时段增加文化讲解（如“虹桥”地名源自1909年沪杭铁路桥）。

7 结论

轨道交通语言景观名作为城市语言景观的缩影，既是工具理性的产物，也是文化认同的载体。全球化语境下，需通过科学规范、公众协商与技术赋能，构建兼具辨识度与人文温度的城市符号。未来研究可深入量化分析（如词频统计）与跨文化对比，进一步拓展语言景观的理论与实践维度。

致谢

基金支持：华北理工大学2024年度人文社科后期资助项目“文化传承视角下京津冀地名的语言学

研究”（项目编号：2024SKHQ07）。

参考文献

- [1]尚国文, 赵守辉. 语言景观研究的视角、理论与方法[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14, 46(02): 214-223+320.
- [2]Landry, R., & Bourhis, R. Y. (1997). Linguistic landscape and ethnolinguistic vitality: An empirical stud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Sociology of Language*, 155/156, 149–163.
- [3]Jaworski, A., & Thurlow, C. (Eds.). (2010). *Semiotic Landscapes: Language, Image, Space*. Continuum.
- [4]Coulmas, F. (2002). The linguistic landscape: A comparative study of urban multilingualism in Tokyo. *Journal of Language and Social Psychology*, 16(1), 23–49.
- [5]Ben-Rafael, E., Shohamy, E., Amara, M. H., & Trumper-Hecht, N. (2006). Linguistic landscape as symbolic construction of the public space: The case of Israel.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ultilingualism*, 3(1), 7–31.
- [6]Scollon, R., & Scollon, S. W. (2003). *Discourses in Place: Language in the Material World*. Routledge.
- [7]刘明阳. 语言服务视角下城市轨道交通语言景观研究[J]. 城市轨道交通, 2025, (03): 56-59.
- [8]莫海英. 大连市轨道交通公示语英译质量调研报告[D]. 大连外国语大学, 2024.
- [9]刘宇婷. 基于SPEAKING分析模式的长春市语言景观研究[D]. 吉林大学, 2023.
- [10]熊纳. 语言景观视角下地铁站名标志研究[D]. 南京大学, 2019.
- [11]夏乐. 基于场所符号学理论的城市轨道交通语言景观研究——以合肥市为例[J]. 哈尔滨学院学报, 2020, 41(07): 108-110.
- [12]吴一凡, 李小云. 语言景观建设助力乡村价值提升——云南乡村振兴示范村的实践与思考[J].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02): 139-149.
- [13]沈骑, 孙雨. 论城市语言景观的空间符号互动观[J].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52(06): 70-77.

